

港人應自強——從英國御用大律師大衛·佩里辭任說起



一個崇尚法治的社會，政府不相信自己的法律人才，是不能夠取信於國際社會的。香港特區政府要通過大衛·佩里聘任事件，看清英國、美國等號稱法治社會的國家的真實面目，從而更加重視、倚重香港的本地人才。這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精神所在。

王貴國 教授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前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院長

近日，香港特區政府為了籌備控告黎智英涉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等罪行，特意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大衛·佩里(David Perry)為主控官。此事本來是一樁純粹的法律外判項目，應該是香港特區政府認為此案重要，故需從英國聘請足夠分量的法律專家作為主控官。此做法在香港回歸前有之，在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之後仍然有之。此外，在很多大案要案中，香港特區政府也經常聘請英國的大律師或御用大律師作為政府的法律代表出庭。

通常情況，這些案子都是涉及數額較大、社會影響較大的個案。此做法在香港社會，包括法律界，形成一種印象，即英國的法律界(法官、律師、教授)在法律專業方面更優勝，至少在解釋和適用普通法方面如此。其潛台詞就是香港法律界的水平過低，尚不足以勝任處理大案要案。然而，香港很多資深大律師原來也是英國的御用大律師，也在英國等地辦案。

英國將政治凌駕法律

本次香港特區政府再次沿襲前做法，聘請大衛·佩里御用大律師擔任黎智英案的主控官，想必也是出於英國法律專家的能力高於香港本地專家的考慮。當然，這只是本人的猜

測。如有不當，還請香港特區政府批評指正。

平心而論，香港許多民事案件的當事人都會聘請英國的大律師出庭。這是當事人的私人決定，其他人不應置喙。但政府聘請什麼人作為法律顧問則需要向社會交代。料想，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擔任黎智英案的主控官，更多的應該是基於專業的考慮。令人遺憾的是，大衛·佩里的聘任受到英國政府前任和現任外交大臣等的公開指責，最後不得不辭任。

一些善良的朋友認為，英國政府不應該將政治凌駕於法律，公開干預一個法治社會的正常運行。然而，這只是良好的願望，政治和法律從來都沒有分開過。在任何社會，包括自稱為高度法治化的英美等國，也沒有人敢說政治和法律是截然分開的。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任內所為，特別是在任期行將結束時的所為，就是明證。

香港法律界的相當一部分人歷來以英國馬首是瞻，在法律解釋等方面動不動就以英國人是如何如何說的為準則，從而漸次失去對自己的信心以及法律的部分解釋權。人們不禁要問，中國的法律、香港特區的例法應如何理解，難道英國人或其他外國人比中國人更有發言權？縱觀整個世界，香港也可謂奇葩。

通過大衛·佩里事件不難看出，香港社會受港英管治文化的影響根深蒂固。要解決此問題，必須從香港特區政府入手。香港特區政府的一眾高官，應首先樹立中國人自強不息的精神，首先要相信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傳統，要相信香港人有能力將自己的事情辦好。當然，香港人也不應妄自尊大，要虛心學習任何社會、任何個人的優點。

回看香港特區政府過去幾年的表現，特別是在疫情中的表現，不得不說是非常令人沮喪和失望。出現這些問題的一個根本原因，是其總以為較內地優越，過多地強調制度的不同，因此做事方法，包括抗疫的方法也必須不同。

香港特區政府予人的感覺是，之所以不願意向內地學習，是因為如果學習內地的先進經驗(如抗疫)，便會被人標籤為只注重「一國」，而不注重「兩制」。同時，特區政府官員跟從英美等國的防疫做法，即使無效也不會受到譴責，也不必承擔責任。這是香港社會的根本問題！

應重視香港本地人才

讓我們再回到對黎智英案的主控官問題。現在香港特區政府說換了本地的大律師主控，但

不能說該大律師的名字。出於對相關大律師的保護，這樣做可以理解。然而，在一個號稱高度法治的社會，難道政府聘請大律師作為主控官，是一件見不得人的事嗎？如果是怕相關大律師承擔太大壓力，難道以後其就不出庭嗎？如果出庭，是否會受到同樣的壓力，或者是更大的壓力？一個不能承受此壓力的大律師能勝任主控官的職責嗎？這樣的事情發生在香港，大家已經是見怪不怪。在其他國家，任何律師獲政府聘任都會認為是很大的榮譽，都會在自己的簡歷中特別標出。香港也太奇葩了。

香港特區政府的上述做法反映了不夠自信，對香港法律界不夠信任。一個崇尚法治的社會，政府不相信自己的法律人才，是不能夠取信於國際社會的。

我們希望，香港特區政府能夠從大衛·佩里聘任事件中，看清英國、美國等號稱法治社會的國家的真實面目，應重視、倚重香港的本地人才。這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精神所在。

我們呼籲香港特區政府將施政的重點放在培養年輕一代，對本民族的文化、傳統、能力、精神多一些了解、多一些自信，努力做到自強不息。

抗疫紓困不成功 重振經濟會落空

盧偉國 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主席

日前，經民聯向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提交2021至2022年度《財政預算案》的建議。「抗疫紓困，重振經濟」，這兩大主軸就像一個銅錢的兩面：抗疫紓困不成功，重振經濟會落空。作為負責任的政府，不能對民間疾苦坐視不理，反而應該在社會困難時期推出逆週期措施，作出適當投入，以達至在疫情下「重振經濟，改善民生」的目標。

善用基金補充社會所需

為了解決公共財政「手頭緊絀」的問題，我們認為特區政府面對非常時期，理應創新思維，廣開財路：一方面，當局應率領推出「抗疫發展債券」計劃，為應付各類防疫抗疫開支，以及為支援各行各業、推動疫後復甦籌集資金，幫助香港盡快走出疫情的陰霾，這樣既可善用社會資金，又為市民提供穩健的投資選項。另一

方面，特區政府在一般收入賬目以外，還有八個基金作為財政儲備的一部分，儘管這些基金，例如資本投資基金、賑災基金等，其涵蓋範圍和用途受當初成立有關基金所依據的法律條文規管，政府為了應急不妨「特事特辦」，撥出當中的一部分應對當前經濟環境下的社會所需，待經濟好轉時才重新回補。

特區政府如果採取上述辦法緩解公共財政面臨的巨大壓力，就可以有較大的彈性，加大對市民及各行各業的紓困建議，包括應暫緩來年的暫繳稅、寬減利得稅、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100%，上限可提高至4萬元；同時調升現有各類免稅額，以及寬減差餉，切實減輕市民生活負擔。此外，經民聯亦建議容許僱主和僱員停供強積金6個月，增加他們的現金流，並期待財政預算案推出更多鼓勵

市民消費、提振經濟的措施。

加快落實智慧城市藍圖

在重振經濟、為本港注入新動力方面，首先應增撥資源，在科研投放、科技產業化和科技人才需求等方面，致力吸引更多科網企業來港；其次，應設立50億元智慧城市專項基金，加快落實已在上月公布的《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第三，應發展香港成為區域專業服務中心，並設立專項基金，加強支援工程業界和其他專業界別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和創業。

至於扶助中小企，政府應推出生級版「中小企免息貸款計劃」，調高「百分百擔保安排」貸款額至800萬元，延長「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期限。同時優化專為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行銷市場而設的「BUD專項基金」並調升資助上限等。



中美關係應理性重回正軌

周錫生 東南大學國際戰略智庫研究員

拜登昨宣誓就任美國第46任總統，特朗普灰溜溜地離開了白宮，這是他堅持極端主義的必然結果。特朗普不僅攪亂了美國和世界，也給美國和世界同時造成了嚴重混亂和危害。對特朗普及其極端主義必須清算，並從中汲取教訓，這是美國輿論的強烈要求，也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呼聲。

拜登的就職演說全文翻譯成漢字約4,700字，總體看來理性內斂。雖然拜登在演說中側重談了美國國內問題，但也表示將「再次與世界進行接觸」，並強調解決美國當前「這些問題的答案不是轉為內向，退縮到對立派系當中，不信任那些模樣和你不同的人、信仰方式和你不同的人或者新聞來源和你不同的人」。

拜登展示新政府理性的一面

拜登這番話的含義已經相當清楚。至少在拜登看來，這個世界應該是互相接觸的，多元化的，而不是單邊主義、極端主義的，彼此脫鉤的。

在過去四年裏，以所謂的「美國優先」單邊主義和極端民粹主義為煽動蠱惑，嚴重破壞了美國的傳統政治與外交，而中美關係則是特朗普及其鷹派幕僚國際破壞的重災區。特朗普之流毫無底線，把中美關係推到了建交以來最動盪和最危險的境地。拜登上台及其就職演說，讓人們看

到了美國新政府理性的一面。拜登強調的美國修補、恢復和癒合應當包括美國的國際關係，而中美關係的修補、恢復和癒合應是題中之義。

美國與中國早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就開始交往了。在歷史的長河中，特別是本世紀以來，中美兩國的關係得到了全面發展，雙方在政治、外交、經濟、貿易、金融、軍事、安全、產業、科技、能源、人文和互聯網新經濟等各方面都有了互相聯繫和日益緊密的交往，也因此給中美兩國都帶來了福祉。如果這種關係能繼續下去，中美兩國和兩國人民、企業、產業等都會進一步受益。對此，美國很多有識之士特別是經貿企業界和廣大消費者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也是熱切期盼的。

但到了特朗普時期，美國逐漸變了，並演變到徹底變了。特朗普對中國採取極端打壓和全面圍堵政策，既是其極端民粹主義的必然，也是蓬佩奧、納瓦羅、博爾頓、班農等一批極端分子出謀劃策、煽風點火、推波助瀾使然。

中美關係有重啓對話的可能

如果說起初人們還看不清特朗普之流國際極端和惡毒反華的本質和目的，則四年後的今天他們已充分暴露，也因此遭到了徹底失敗。美國大多數選民已拋棄他們，世界輿論在取笑和嘲笑他們。特朗普政府的反國際和反華政策已經徹底失敗。

中國和美國都是世界大國，都具有重大的影響力。在世界的地平線上，國家的發展與力量的變化本屬正常，這是國家戰略與發展舉措所決定的，美國試圖阻止中國的發展，只能是白日做夢，但若互利合作，就能帶來互利共贏。

毋庸諱言，中美兩國是不同的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人文和價值觀、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異，但正如拜登所言，這並不影響彼此的合作和交往。

中國對美政策是一貫之的，始終是善意與和平的。中國的內外政策和戰略意圖是公開、透明的。中方致力於與美方發展不衝突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關係，同時將堅定維護自身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中方堅決反對美方干涉中國內政，希望美方正確看待中國和中美關係，彼此相向而行，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動中美關係重回正確軌道向前發展。

拜登執政，相信中美關係有改變的機會，有重啓對話的可能。但由於美國和中美關係都遭到了重大破壞，修復需要時間，拜登執政之後需要首先解決美國的疫情和政治安定等緊迫問題。我們要給予拜登政府時間和冷靜考慮的機會，不必過急，但相信拜登政府會審時度勢，順應世界潮流與國際期待，在中美關係的應對處理上作出理性、正確的選擇。

黃均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教聯會會長

由「大張旗鼓」變「偃旗息鼓」

教協欠業界一個交代

早前50多名因參與「初選」的反對派中人，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而被捕並已獲釋。這些人幾乎遍布反對陣營，唯獨教協的代表葉建源獨善其身，原因當然是他沒有參加「初選」。戴耀廷提出的「35+初選」，教協沒有站隊，我還以為教協回復了當年華叔獨排眾議、拒絕「五區公投」之勇，但觀乎後來事態的發展，確實是過估了。

記得在去年8月的時候，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現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不少於一年的決定，當時教協就葉建源的去留進行了7天的電話調查，並找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借口發文《教協報》、臉書和WhatsApp，力陳「留任的使命和目的」，最後成功游說會員，過半數受訪者支持葉建源，並「依正手續操作」，由理事會通過，手續完備，文件齊全。

然而，一連串留任操作過後，竟不敵一聲「政治號令」，葉建源還是跟隨「攞炒」大隊「鬧辭」去了，會員的期望被辜負，業界的意見傳不到議會。離開建制架構，聲音必然減弱，參政議政的成效必定大打折扣，葉建源不會不知道，只是他服從「政治號召」，在去與留的利害得失之間，政治蓋過了專業。

葉建源是教協推舉出來的代表，可是至今仍不見教協有任何說法，只有葉建源個人透過不同媒體和平台發表自己的意見。當初支持教協的會員，終究投了個寂寞；教協由9月的「大張旗鼓」變成11月的偃旗息鼓，草草收場，沉默神隱，一眾會員和老師成了「鍾無艷」。

教協為何沒有參加「初選」，原因不明，因為教協也從來沒有就此事諮詢會員或表明原因。然而，教協在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中長期佔據議席，誰去代表教育界完全由教協內定。議席既是囊中物，又何必多此一舉，把決定權拱手讓予他人呢？



學史明理 意義深遠

陳曉林 廣東省社科院特約研究員

近日，新華社、央視新聞、大公報、香港文匯報、香港商報等數十家媒體都在報道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1月15日，《世紀長征》系列紀錄片啟動禮在香港舉行，標誌着《世紀長征》系列活動正式拉開帷幕。

此項活動非常有意義，筆者主要有以下三點考量：

一是開展此項活動，具迫切性。近年來，香港社會陸續出現了一些亂象，這反映部分香港青年人的國家、民族、文化認同出現了問題。比如在香港修例風波中，有人揮舞英國、美國甚至港英年代的旗幟；「違法達義」、「民族自決」等奇談怪論大行其道，成為煽惑年輕人追隨「港獨」、反中亂港的價值觀。

這些問題的直接根源之一就在於教育，香港對青少年的國民教育開展得不深不透、不嚴不實，教育的途徑、渠道缺乏針對性和實效性。因此，對如何有效加強香港青少年國民教育的問題顯得十分迫切。

二是開展此項活動，恰逢其時。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100年來，中華民族從民族救亡走向民族復興。正如《世紀長征》系列活動籌委會召集人梁唐青儀表示，過去百年，中華民族歷盡滄桑，「一百年彈指一揮間」，正是適當時候回顧中國近代歷史的「世紀長征」。

三是開展此項活動，意義深遠。活動主辦機構與香港教育局、香港電台合作，還將舉辦一系列橫跨一整年的學校和社區活動，如「學界菁英問答比賽」、「近代歷史圖片巡展」、「網上推廣宣傳」等，讓青少年認識祖國過去百年的巨變，增進他們對國家發展的認識；通過《世紀長征》系列活動讓更多的社會團體和熱心人士都來參與和支持，讓青少年及市民大眾更加認識近代中國發展歷史，加強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

要扎實有效開展香港青少年的國民教育，就要大力增進香港青少年對國家、民族和文化的認同，特區政府要更主動積極作為，認真研究並採取適當措施，讓香港青少年學生對自身國民身份的認識建立在豐富堅實的歷史與事實根基之上，使他們由衷地認同自己的國民身份，發自內心地為自己的國家而感到驕傲。

